

**A STUDY ON LANGUAGE PATTERNS AND COUNTERMEASURES IN BUSINESS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CIS COUNTRIES**

Erkinova Shakhnozabonu Oybek kizi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Uzbekistan State University of World Languages, Specializing in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and Intercultural Business Communication

Email: erkinovasahnoza2@gmail.com

Khakimova Shakhnoza Erkinovna,

Instructor, Head of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Professor, Uzbekistan State University of World Languages, Specializing in Chinese Linguistics and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Email: Sharona84@mail.ru

**Abstract**

本文探讨了中国与上合组织国家，特别是中亚地区在商务往来中语言使用的现状、主要障碍及应对策略。研究显示，当前商务沟通呈现出“俄语为主导、中文逐渐上升、英语作为辅助”的多元共生格局。得益于历史惯性与制度优势，俄语依然占据主导地位；而随着中国经济影响力的增强，中文的使用频率显著提升，英语则在多边场合中发挥辅助作用。然而，专业术语的误译、翻译质量的不稳定以及文化语境的差异等问题，制约了沟通效率。针对这些挑战，本文提出了人才培养、工具支持与本地化策略相结合的解决方案，旨在构建更加高效和稳定的商务沟通机制。

**关键词：** 商务沟通；语言格局；上合组织；中乌合作；翻译质量。

**Introduction**

*引言*

近年来，随着上海合作组织内合作的不断加深，中国与中亚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持续上升。尤其是在中乌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背景下，双方在能源、交通、制造业和教育等多个领域的合作愈加紧密。语言作为商业交流的基本工具，在谈判、合同签署、项目实施及人员沟通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实际合作过程中，丰富的语言环境不仅为区域间的交流提供了便利，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挑战。俄语在该地区长期以来占据重要地位，随着中国经济影响力的提升，中文的使用逐渐增加，而英语在某些多边场合中则扮演着辅助手的角色。因此，有必要对

当前中国与上合组织国家之间的商务沟通语言格局进行系统性的分析，并探讨其主要问题及优化的路径。

### 一、商务沟通中的语言格局

在中国与上合组织国家，尤其是中亚地区的商业与战略合作日益加深的背景下，语言不仅是沟通的工具，更是区域一体化和多边合作的重要基础。目前，中国与上合组织国家的商务交流呈现出一种“俄语主导、中文上升、英语辅助”的多元语言共生格局；与此同时，独联体国家也在积极推动俄语的制度化发展——2023年10月，独联体国家元首在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会议期间，响应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的倡议，签署了《关于成立支持俄语的国际组织》的文件，旨在巩固俄语作为区域通用语言的地位，促进文化、教育、科研等领域的合作，并提升其在全球的影响力。

#### （一）俄语的主导地位：历史惯性与现实功能的双重支撑

俄语在上合组织区域内实际上作为工作语言的地位，源于其深厚的历史背景和制度惯性。早在2006年，上合组织秘书处的公文中有99%使用俄语，除了中国以外，其他成员国的工作人员普遍缺乏汉语能力。即使在今天，俄语依然是区域内商务活动、政府间磋商、技术标准对接及法律合同文本中的主要语言，已形成完整的术语系统和操作规范。

这一地位在中亚尤为明显。以乌兹别克斯坦为例，尽管在独立后将乌兹别克语定为官方语言，但俄语在教育、科技和经贸等领域仍被广泛使用。在中乌的商务交流中，俄语长期以来充当着“桥梁语言”的角色——从传统能源和农业合作到比亚迪等高科技企业的落地设厂，俄语贯穿了项目洽谈、技术交流与合同执行的整个过程。

全球约有3亿人掌握不同程度的俄语，作为联合国六大官方语言之一，它也是科学、技术和跨民族交流的重要工具。独联体国家推动成立“支持俄语的国际组织”，旨在巩固这一历史纽带，以应对当代的挑战，并通过加强语言合作来深化区域一体化进程。

#### （二）中文的上升趋势：中国经济影响力驱动的语言新变量

近年来，伴随着中国与上合组织国家经贸关系的迅猛发展，中文在这些国家的使用频率显著提高，特别是在乌兹别克斯坦。自2017年以来，中乌贸易额已增长两倍，达到140亿美元；中国对乌兹别克斯坦的直接投资累计达246亿美元。随着经济的深度融合，乌兹别克斯坦的年轻人学习中文的热情日益高涨，中文不仅已被纳入中小学的第二外语课程，还在高等院校中得到广泛开设。

中国企业的“走出去”战略进一步加快了中文的实用化进程。例如，比亚迪计划于2024年在乌兹别克斯坦设厂，这不仅引入了资金和技术，同时也带来了中文的管理模式和企业文化。此外，中吉乌铁路项目将于2024年12月正式启动，作为连接中亚与中国的最短陆上通道，该项目需要大量的中文技术文档、运营规范和标准体系，使中文在基础设施合作中成为关键语言。

在教育合作方面，孔子学院已在塔什干和撒马尔罕设立，中国高校也在乌兹别克斯坦开设了分校。2024年9月将揭牌的乌兹别克斯坦鲁班工坊则将中文融入职业技能培训，体现了语言与产业的深度融合。2025年6月中乌互免签证协定的生效，将进一步促进人

员交流，拓展中文在日常商务与社会场景中的应用。值得强调的是，中文的崛起并不意味着取代俄语，而是在特定领域形成互补。复合型人才通常能够同时掌握中文、俄语和本国语言，能够灵活应对不同场景，实现高效沟通。

### （三）英语的辅助角色：国际通行语的有限适用性

在上合组织的多边场合中，例如2025年峰会的新闻中心，英语仍然具有象征性和功能性，常用于国际媒体的交流或跨语言的翻译。例如，当中国记者在用俄语采访时遇到困难时，可以通过英语进行过渡，之后再转述为俄语。然而，在双边商业实践中，英语并未成为主流沟通语言。

在乌兹别克斯坦，商界人士更倾向于使用俄语或乌兹别克语。同时，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直接使用中文进行沟通，英语的中介作用被进一步削弱。尤其是在涉及专业术语、文化内涵或具体业务细节时，英语往往难以准确传达。因此，英语在这种环境中更多地充当“备用选项”，仅在俄语沟通存在障碍或中方派遣非俄语背景的人员时临时使用。

## 二、主要语言障碍分析

在中国与上合组织国家，尤其是乌兹别克斯坦日益紧密的商务合作中，语言既是沟通的桥梁，也可能成为误解的源头。随着中乌“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双方在能源、基建、制造、农业等领域的项目合作愈发频繁，语言障碍所引发的实际问题也逐渐显现。这些障碍不仅体现在技术层面的翻译准确性上，更深层地根植于文化认知与表达习惯的差异，对合作效率与信任建设构成潜在挑战。

### （一）专业术语误译：关键文本中的准确性风险

在国际商务合作中，合同、技术规范和法律文件等关键文本的翻译质量对项目的成败至关重要。专业术语一旦翻译错误，轻则导致理解偏差，重则可能扭曲权利与义务的关系，甚至引发法律纠纷。

从语言学的视角来看，这类问题可以归类为“语言语用失误”，即由于语言使用不当造成的信息传递失真。在中乌合作中，这种风险在技术密集型领域尤为明显。例如，在油气勘探、电力工程或新能源项目中，地质术语、设备参数和环保标准等专业词汇若翻译不准确，可能导致技术方案的执行偏离原意，从而影响工程质量或验收结果。

法律文本的翻译风险同样不容忽视。中国的法律体系属于大陆法系，而乌兹别克斯坦的法律体系则受到苏联法的深刻影响，两者在概念的定义上存在差异。例如，“不可抗力”在中文合同中通常包括自然灾害、战争和政府行为等情况，但在乌兹别克斯坦的法律语境中，其适用范围和证明标准可能有所不同。此外，“违约金”条款在中方通常兼具补偿与惩罚的双重性质，而乌方可能更侧重于其补偿功能。如果在翻译时未充分考虑这些制度背景，仅进行字面对应，极易埋下争议的隐患。

在实际操作中，术语误译常见于以下三类场景：

1. 新兴行业术语：例如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和绿色能源等领域，乌兹别克语尚未形成统一或权威的译法；

2. 技术标准对接：中方通常采用国家标准（GB），而乌方多沿用独联体GOST标准，这两者在指标定义和测试方法上存在差异，简单直译可能引发技术误解；
3. 财税政策术语：涉及增值税抵扣、关税减免和投资优惠等政策时，术语翻译的准确性直接影响企业的合规判断与成本测算。

### （二）翻译质量不稳定：信息失真与人才缺口

除了术语问题之外，整体翻译质量的不稳定性也是中乌商务沟通中的一个重要障碍。这种不稳定性不仅存在于口译过程，还体现在笔译成果中，常常表现为信息遗漏、语气偏差和逻辑混乱等问题。

在口译场合，译员的专业素养和临场判断能力至关重要。2021年中美高层对话中有一个典型的警示案例：美方翻译擅自加强措辞，添加了攻击性内容，而中方译员张京则以高度精准和克制的方式还原了发言的原意，凸显了专业口译在外交和商务谈判中的关键作用。在中乌商务谈判中，如果译员未能准确传达“这个价格我们很难接受”和“这个价格我们可以再讨论”之间的语气差异，可能会导致对方误判底线，从而使谈判破裂。

笔译方面的问题则更为隐蔽，但影响深远。常见的问题包括：文体不统一（例如正式合同中夹杂口语表达）、遗漏关键条款、机械地应用词典释义而忽略上下文，甚至随意增删内容。例如，某中资企业在向乌方交付农业机械时，由于操作手册翻译粗糙，未明确说明安全启动步骤，导致当地技术人员误操作，不仅耽误了农时，还险些引发事故。

值得注意的是，许多企业为了提高效率，过于依赖机器翻译工具。2024年，山东枣庄一家民营企业在与拉美客户沟通时，使用在线翻译工具将一句友好的提醒“这是我们的建议”翻译成了“我方单方面要求涨价”，最终导致了合同纠纷。尽管这一事件发生在美洲，但其教训对于中亚市场同样具有借鉴意义——未经人工校对的机器翻译在处理复杂语境或文化敏感表达时，往往会“好心办坏事”。

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复合型翻译人才的严重短缺。理想的中乌商务翻译需同时掌握中文和乌兹别克语（或俄语作为中介），熟悉相关行业知识，并具备跨文化沟通意识。然而，现实中这类人才非常稀缺，许多企业不得不采用“接力翻译”的方式：先将中文翻译成俄语，再将俄语翻译成乌兹别克语。每增加一次转换，信息失真的风险就会显著上升。

### （三）文化语境差异：看不见的沟通鸿沟

如果将术语和翻译问题视为“技术性障碍”，那么文化语境的差异则构成了一种更深层且隐蔽的“认知性障碍”。尽管中国和乌兹别克斯坦同处亚洲，但在沟通风格上却存在系统性差异。

根据跨文化学者爱德华·霍尔（Edward T. Hall）的理论，中国被归类为典型的“高语境文化”（high-context culture），在这种文化中，大量信息隐含于语境、关系和非语言信号之中，人们习惯于“话中有话”，并重视含蓄和留白。而乌兹别克斯坦虽然仍保留了

一部分高语境特征（如重视人情和面子），但由于受到苏联及俄罗斯管理文化的长期影响，其商务沟通更倾向于“低语境”风格，强调语言的清晰、直接和明确。这种差异在实际合作中常常导致误解。例如，当中国代表说“这个方案我们还需要内部研究一下”时，在高语境文化中通常意味着婉拒；然而如果乌方按照低语境的逻辑理解，可能会认为仍有协商的空间，继续投入资源推进，最终导致时间和机会成本的浪费。

类似的情况并不少见。厦门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曾记录到一个典型案例：一位新加坡商人与中国供应商多次联系以安排会面，但对方的助理反复回应“王总可能要出差，到时可能不在上海”。中方始终在等待，却不知“可能来不了”实际上是“不会来”的委婉说法。这种现象在中乌合作中同样存在——乌方商务人士若对中方的委婉表达习惯不够熟悉，容易将“有难度”理解为“可以克服”，将“再考虑”误解为“即将同意”。

此外，文化差异还体现在具体的行为层面：

- 商务宴请：中方常通过敬酒来表达诚意，但如果未提前说明文化背景，乌方可能会误认为这是强制性的社交压力；
- 谈判沉默：中方有时用沉默来表示慎重或保留意见，而乌方可能会解读为缺乏兴趣或准备不足；
- 合同执行：中方在履约过程中倾向于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而乌方则更强调条款的严格遵守，若未事先沟通协调，容易产生“不守信用”的误解。

值得欣慰的是，随着2025年6月中乌互免签证协议的正式生效，两国商务人员的往来将更加便利，面对面交流的机会显著增加。这为增进相互理解、弥合文化认知差距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关键在于，双方需主动意识到文化差异的存在，并在沟通中保持开放、耐心与换位思考的心态——唯有如此，语言才能真正成为合作的助力，而不是障碍。

### 三、提升沟通效率的关键对策

化解语言障碍，既需要系统性的人才培养，也离不开企业层面的机制创新与深度本地化。针对前文所述的专业术语误译、翻译质量不稳定、文化语境差异等核心问题，本节从人才培养、工具支持、本地化策略三个维度提出针对性解决方案，旨在构建更高效、精准、互信的中乌商务沟通体系。

#### （一）人才培养：打造“语言+专业”复合型人才培养梯队

人才是解决语言障碍的关键因素。目前，中乌商务沟通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实际上反映了复合型人才的短缺。这类人才不仅需要熟练掌握中文、俄语和乌兹别克语，还应在经贸、法律和技术等领域具备深厚的知识，并拥有跨文化理解能力。因此，具备这些能力的高端翻译和商务人才在市场上依然是稀缺资源。

优化教育供给结构刻不容缓。中国高校应加强中亚语言，尤其是乌兹别克语的人才培养，逐步打破以往单一依赖“俄语通中亚”的模式。实地调研显示，尽管俄语依然是该地区的通用语言，但在政府协调、社区沟通和本地化运营等场景中，掌握乌兹别克语的优势日益显著。2024年，乌兹别克斯坦将正式将汉语

入中小学课程，中国高校也应考虑将乌兹别克语纳入非通用语种的建设规划，以实现两国教育布局的有效对接。

强化专业素养的培养更为重要。优秀的商务翻译不仅应是信息的“传递者”，更应成为理解业务逻辑的“智囊团”。人才培养应采取“语言+专业”的复合路径，语言专业可以增设经贸、法律、工程技术等辅修模块，而相关专业也应加强语言训练。天津外国语大学等院校在上合组织峰会期间提供的高质量语言服务证明了复合型人才培养的可行性。

更新俄语人才培养模式同样至关重要。传统的俄语教育通常侧重于文学和语言学，对于经贸实践的涉及较为有限。在当前中乌商务合作中，俄语人才不仅需要参与商务谈判，还需处理技术文档，并协调政府关系及合作伙伴事务。因此，俄语教学应当引入商务俄语、法律俄语、科技俄语等细分领域，让学生在校期间能够接触真实的商务环境。

乌兹别克斯坦方面也在积极推动中文人才的培养。近年来，撒马尔罕孔子学院和塔什干孔子学院的规模持续扩大，中国高校在乌兹别克斯坦开设分校的探索也在不断推进。2024年将揭牌的乌兹别克斯坦鲁班工坊采用了“技术+中文”的培养模式，直接面向产业发展需求培养实用型人才，这一模式值得推广。随着中乌教育合作的深入，一批既懂技术又掌握中文的本地人才将逐渐成长，成为两国商务沟通的重要力量。

多元化的人才培养途径不可或缺。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周期较长，短期内难以满足快速增长的市场需求。因此，除了学历教育外，职业培训、短期研修和企业内训等形式也应纳入人才培养体系。中资企业在乌的分支机构可以设立内部翻译培养计划，选拔具备语言基础的员工进行专业培训，使其成长为熟悉企业业务并掌握俄语或乌兹别克语的核心力量。复合型人才培养的可行性。

## （二）工具支持：构建三语对照商务文件库

人才培养需着眼于长远发展，而工具支持则能迅速产生效果。为了解决专业术语误译和翻译质量不稳定的问题，构建一个中、俄、乌三语对照的商务文件库是一条切实可行的方案。

该文件库的核心价值在于术语的标准化。在能源、农业和基础设施等中乌合作的重要领域，专业术语往往需要经过多语言转换——从中文到俄语，再到乌兹别克语。如果没有统一的术语标准，同一概念在不同文件中的翻译可能会出现很大差异，导致理解上的混乱。三语对照文件库可以为企业提供权威的术语参考，从而降低信息误差的风险。

文件库应包括三大类内容：首先是合同文本范本，包括采购、工程承包和合资协议等常用法律文件的三语对照版本；其次是技术文件汇编，涉及设备操作手册、技术标准规范和产品说明书等，重点在于统一技术术语的翻译；最后是商务函件模板，涵盖询价、报价、订单确认和催款通知等日常往来文件，帮助企业规范沟通格式。

多方合作共建是文件库成功的关键。行业协会可以牵头组织翻译专家、法律顾问和技术工程师共同参与术语的审定，确保译文的准确性和专业性。在乌的中资企业可以贡献自己积累的文件资料，经过脱敏处理后纳入文件库，实现知识共享。同时，两国政府部门也可以发挥引导作用，推动成熟的翻译规范上升为行业标准。

数字化应用将显著提高文件库的实用性。企业可以将文件库整合进内部管理系统，员工在起草合同时能够直接调用相关的模板和术语。此外，机器翻译工具可以与文件库进行对接，优先使用库中的标准翻译，从而减少常见术语的错误。一些企业已经开始探索建立内部翻译记忆库，将经过人工审核的译文存入数据库，以便在需要时直接调取，避免翻译质量的波动。

文件库应保持灵活性，其核心价值在于减少日常沟通中的信息误差，使企业能够将更多精力集中在处理非常规问题上，而非单纯追求“万能模板”。

### （三）本地化策略：聘用本地语言助理弥合文化鸿沟

如果将人才培养比作“造血”，而文件库建设看作“输血”，那么聘请本地语言助理则是直接的“补血”。本地语言助理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其母语能力能够确保语言表达的准确性和地道性，更在于他们的文化理解能力能够帮助中方企业跨越文化障碍，真正融入当地的商业生态。

本地语言助理的核心价值在于其充当文化中介的角色。前文中提到的文化语境差异表明，高语境文化和低语境文化之间可能存在潜在的冲突。中国商务人士的委婉表达、含蓄拒绝和灵活应对，可能让对中国文化不熟悉的乌方伙伴感到困惑；反之，乌方的沟通方式，中方也未必能够准确理解。因此，本地语言助理在这一过程中能够发挥独特的调和作用。

本地语言助理应扮演“文化翻译”而非单纯的“语言翻译”。他们不仅需要准确传递语言信息，还需帮助中方理解对方的言外之意、表达习惯和谈判策略，并以对方能够接受的方式传达中方的意图。在商务谈判中，本地助理可以适时提示：“对方的这种说法实际上是强烈反对，只是出于礼貌没有直接表述”或“我方的提议遇到冷淡反应，可能需要换一种表达方式”。这种文化层面的沟通，是机器翻译甚至普通翻译难以胜任的。

实践经验表明，中资企业在乌兹别克斯坦雇佣本地语言助理已逐渐成为一种趋势。这些助理通常掌握俄语和乌兹别克语，部分还能够使用中文，能够在不同语言之间灵活切换。他们对本国的商业规则、政府运作以及社会习俗有着深入了解，能够帮助中方企业有效规避制度风险和文化冲突。在合同谈判、政府协调及社区关系维护等关键环节，本地助理的参与通常能够提升沟通效率，降低误解的风险。

合理的聘用方式至关重要。企业应当给予助理充分的信任与授权，让他们成为核心团队的一部分，参与重要决策，而不是仅仅将其视为“翻译工具”。与此同时，企业也应关注助理的职业发展，为他们提供培训机会，以帮助其提升业务能力，实现个人成长与企业发展的同步。一些中资企业已经开始选拔优秀的本地员工前往中国培训，使他们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文化及企业文化，这一做法值得推广。

从宏观角度来看，雇佣本地语言助理不仅是沟通策略，更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途径。在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企业若想实现长期发展，必须真正融入当地社会，赢得本地员工的认同与支持。本地语言助理在这一过程中能够发挥桥梁作用，帮助建立中乌员工之间的信任关系，促进团队的融合。

### 结论

中国与上合组织国家间的商务交流语言格局正在经历深刻的变革。俄语凭借其历史根基和制度优势继续占据主导地位，中文因中国经济影响力的不断增强而迅速上升，英语则在多边场合中发挥辅助作用。这种“俄语主导、中文崛起、英语辅助”的多元共生格局，既体现了区域一体化的历史延续，也反映了新时代经济合作的现实需求。

然而，语言障碍依然是影响商务沟通效率的重要因素。专业术语的误译可能导致项目失败，翻译质量的不稳定会影响信息传递的准确性，而文化语境的差异则可能引发深层次的误解。这些问题不仅增加了商务合作的成本，也妨碍了双方信任的建立。

针对这些挑战，本文提出的“人才培养+工具支持+本地化策略”三位一体的解决方案，为提升中乌商务沟通效率提供了切实可行的路径。人才培养注重长远，通过优化教育供给结构和强化专业素养来保障语言沟通所需的人才；工具支持则聚焦于当前，通过构建三语对照的商务文件库，迅速缓解翻译质量的不稳定问题；本地化策略则强调实效，通过聘用当地语言助理，有效缩小文化认知的差距。

从学术发展的视角来看，本研究展现了汉语言文学专业与国际商务专业之间的深度融合与有机衔接。汉语言文学专业为本研究提供了扎实的理论基础，涵盖了语言学理论、语用学分析和跨文化交际理论等。这些理论工具使得对商务沟通中语言现象的分析更加深入和准确。特别是在文化语境差异的分析中，霍尔的高低语境文化理论与汉语文化特质的结合，为理解中乌商务沟通中存在的认知障碍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国际商务专业则为本研究注入了实践导向和战略思维。基于商务沟通的实际需求，本研究不仅关注语言现象本身，更强调语言如何影响商务决策、项目执行及合作关系的建立。这种实践导向的研究视角，使得语言学理论能够更有效地服务于商务实践，同时也为商务活动中的语言问题提供了理论指导。

两个专业的结合形成了“理论指导实践、实践验证理论”的良性循环。汉语言文学的专业背景使得本研究能够深入剖析语言使用的内在规律及文化机理，而国际商务的专业方向则确保了研究成果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这种跨学科的学术视野，不仅丰富了语言学应用研究领域，也为国际商务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

展望未来，随着中乌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不断深化，两国在商业领域的合作将愈加深入和广泛。中吉乌铁路等重要项目的实施，将进一步巩固汉语在技术合作中的地位；乌兹别克斯坦将汉语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为汉语的推广奠定了制度基础；互免签证协议的实施，为人员往来创造了更为便利的条件。在这样的背景下，语言沟通策略需要与时俱进，既要尊重俄语的传统优势，也要积极适应汉语影响力的上升，同时充分利用英语作为国际交流的桥梁作用。最终，语言不仅是沟通的工具，更是文明交流的载体。通过有效的语言沟通，中国与上合组织国家将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构建更加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为区域的稳定与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而汉语言专业与国际商务专业的有机结合，将为这一进程提供更加坚实的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 参考文献

1. Uzbekistan-China Trade, Economic and Investment Forum held in Beijing
2. 上海合作组织语言互通建设的现状及对策 黄雅婷 上海合作组织 研究报告 2022【简介\_在线阅读】电子书\_先晓书院
3. 乌副总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是最重要的国际合作倡议之一 - 全球市场 - 南方财经网
4. 商务英汉翻译中的问题及其对策-上海翻译2005年02期-手机知网
5. 为何独联体国家愿意成立国际组织推广俄语？|俄语|塔吉克斯坦|独联体|苏联\_新浪新闻
6. 上海合作组织发展报告（2022）\_区域国别与全球治理数据库